

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

——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

胡安宁 周 怡

提要:儒家文化必然会降低个体对于一般社会成员信任程度吗?文化研究和基于国家间比较的经验研究都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一些未尽议题的存在让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通过分析2007年的中国居民调查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的确存在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取决于儒家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的维度。当人们更多地重视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那些实践和主张时,我们发现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如果人们将儒家文化看成是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中国人便因为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时认同儒家文化的人就表现出了对他人的高度信任。此外,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面向和一般信任的负关系不是由儒家文化中过分强调对“自己人”的信任造成的。这意味着人们对“自己人”的信任与对“一般他人”的信任并没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一般信任 差序格局 身份认同

一、引言

在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中,信任问题始终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Bohnet & Zeckhauser, 2004; Delhey & Newton, 2003, 2005; Delhey et al., 2011; Hardin, 2006; Inglehart & Baker, 2000; Putnam, 2000; Misztal, 1996; Sztompka, 1999; Uslaner, 2002; Welch et al., 2005; 福山, 2001/1995; 雷丁, 2009/1990)。在各种关于信任的研究中,学者们尤其是西方学者通常将信任划分为基于特定社会联系的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ZD14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社会学研究》匿名评审人及编辑给予本文的诸多指点和帮助。

“特殊信任”(specific trust),以及超越个人社会联系并面向一般社会成员的“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Putnam,2000; Misztal,1996)。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个体对社会一般成员的信任程度会产生极其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Putnam,1993,2000; Rothstein,2002; 福山,2001/1995; 雷丁,2009/1990)。因此,较之特殊信任,一般信任往往在学界得到更多关注,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个体对于他人的一般信任程度。对这一命题,学界已达成了一些共识,指出: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Lin,1977; 福山,2001/1995; 雷丁,2009/1990; 费孝通,1998)。

虽然众多研究均得出类似的结论,但关于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的关系依然存在一些未尽的研究议题。对这些未尽议题的探讨,构成了本文再议儒家文化与一般信任关系的研究初衷。我们希望通过“再议”探究以下问题:(1)从被研究的个体而不是文化与文化间的差异出发,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一般信任?(2)基于一般信任的界定,我们希望进一步探究儒家文化的多维面向以及这些不同面向与个体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独特联系。

二、理论背景及其未尽议题

(一)一般信任与儒家文化:理论背景

所谓一般信任,在西方学界较为普遍的用法是相对于特殊信任而言的。根据已有的理论文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通常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社会联系,这种信任被称作特殊信任。一般信任超越了对于特定社会联系的依赖,面向社会一般成员。一般信任代表了个体对于社会的归属感与信心,常与整体社会的团结程度(solidarity)息息相关。很多学者通过一般信任这个视角来研究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这些主题(Beugelsdijk et al.,2004; Knack & Zak,2002)。目前关于信任的研究几乎都会将一般信任单独提出来进行讨论。例如,普特南(Putnam,2000)在分析美国的社会资本变化时就将一般信任定义为一种稀薄信任(thin trust),意指超越个人社会网络的信任。米祖尔(Misztal,1996)将一般信任看作一种心理属性(psychological attribute),以区别基于家

庭、友情、忠诚于国家一类的情感性信任(trust as passion)。扎克(Zucker,1986)将一般信任理解为一种基于过程的信任(process-based trust),即超越特定个人关系并立足于一般性交换(exchange)的信任关系。

关于一般信任的研究一开始就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少研究都指出了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论述儒家文化会阻碍一般信任的建立与发展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韦伯对于中国儒教的经典分析(Weber,1951)。之后,雷丁(2009/1990)对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具体讨论了儒家文化如何通过塑造海外华人的一般信任水平而影响到其企业发展。福山(2001/1995)有关低信任度国家与高信任度国家的比较分析亦强调了生活在儒家文化圈中的人们对一般化他人有较低的信任水平。在跨文化比较的经验社会学著述中,很多分析将东亚国家归属于一个大的儒家文化圈,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公民体现出了较低水平的一般信任(Delhey et al.,2011;Inglehart & Baker,2000)。总之,现有研究已经达成的一种共识命题为:儒家文化会对身处其中的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产生负效应。然而,仔细审视这一命题,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未尽的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二)未尽的议题 I:个体层面上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的关系

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来体现儒家文化的独特品性及其对一般信任的影响,这是现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进路。典型的例子就是福山(2001/1995)对中国、韩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比较分析。福山之后,跨文化、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成了探索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关系的主要分析视角(如 Delhey et al.,2011;Inglehart & Baker,2000)。

这些宏观分析所论及的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与一般信任的关系或可以看成是身处这个社会或者文化中的所有成员体现出的一种“平均情况”。笔者认为,在研究社会与社会之间“平均情况”上的差异之外,还需要在个人层面上探索一国或者一个社会内部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的关系。而在一个社会内部,不同个体对儒家文化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这种个体层面上的异质性与既有研究所采用的单一而抽象的儒家文化概念形成了对比。如果个人对于儒家文化的诠释是多样化的,那么他们对待一般化他人的态度也有可能不尽相同。例

如,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是一种文化认同,还是一种指导个人行为的价值观念或伦理规范体系,抑或是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佛教这样的宗教身份仍需进一步研究。显然,宏观上定义儒家文化容易遮蔽个体层面的差异,因此,本文更关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个体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差异,以及这些不同个体对陌生他人的信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模式性的关联。

(三)未尽的议题 II:中国社会背景下的一般信任

如前所述,现有西方学界的探讨着重强调了一般信任的对象是“一般化”的社会成员。那么何为“一般化”成员?在具体操作时,这一界定显得简单、模糊并较为抽象。从本质上讲,信任代表着某种人与人、人与机构之间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强弱决定着信任是否发生及其信任水平。换言之,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一个人对于那些“真正”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其实不存在信任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很多社会学经验研究在探讨一般信任时会将重点放在个人信任对象的社会联系强度上面。例如,近期的很多研究都提到了“一般信任的半径”(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这一概念(Delhey et al., 2011; Welch et al., 2007)。与之相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人们在回答诸如“对社会一般成员的信任程度”这样的测量一般信任水平的问题时,他们实际上想到的还是那些和自己多多少少存在某种社会联系的人,而不是理论上所指的那种完全意义上的、抽象的“一般化他人”。由此,一般信任的半径就是指个人的一般信任对象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那些和自己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个人(而非完全没有联系的个人)。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一般信任的研究应当从个人交往对象的社会联系强度出发,而不是从一个抽象的“一般化他人”的角度入手。

以上对一般信任概念的重新解读对探讨中国社会的一般信任问题颇具借鉴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社会交往关系的强调(费孝通,1998;杨宜音,1998,1999,2008; Ho,1991),而这种关系又是能够区分出某种“亲疏”的。这种亲疏关系的区分恰恰是很多针对中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已经采取的分析视角。比如,边燕杰强调了中国社会中“强关系”对于找工作的重要性。他在谈论中国的“强关系”时指出,“一种社会联系可以强或者弱,取

决于这些社会联系所展现的交往时间、情感深度、互相倾诉和相互回报这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Bian, 1997:368)。杨宜音从社会心理形成机制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何以建构“我们”的概念,并由此和“外人”的概念区分开来(杨宜音,2008)。在分析了她在华北地区收集的访谈和观察资料后,杨宜音(2001)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对于“亲疏”的定位既取决于先赋性的诸如亲缘身份这样的因素,也取决于后天彼此之间通过交往而建立的情感、义务等等。^① 中国人交往关系的这种“亲”和“疏”的差异意味着当我们在中国社会里谈论一般信任时,将一般信任的对象定义为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疏远的“外人”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外人”无论从情感归属上、交往频率上还是彼此的义务上都呈现出某种较弱的社会联系,而这正是一般信任对象的重要特征之一。与之对应,笔者认为,对于那些和自己有着比较密切联系的个体的信任(即所谓的“自己人”)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信任。综上,从“关系”的角度出发,笔者将一般信任定义为对那些与自己交往频率低、社会联系弱的所谓“外人”的信任。与之对应,特殊信任是指对那些与自己交往频率高、社会联系强的“自己人”的信任。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自己人”和“外人”这些概念的应用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多见且使用比较随意。在本文中,我们采取了杨宜音(2008)论述中国人判断“亲疏”关系的标准来区分,即所谓“自己人”指与自己有亲缘关系并且因为彼此交往而存在强烈的情感、义务的个人;而“外人”则不存在这些特征。当然,这里的概念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可能通过断绝关系而被排除出“自己人”之列(杨宜音,2008:157)。但是作为一种用于类别区分的概念,笔者认为这里对于“自己人”和“外人”的讨论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

(四)未尽的议题 III:儒家文化影响一般信任的多重机制

如果说一般信任是指对“外人”的信任程度的话,儒家文化会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一般信任水平呢?受杨宜音关于中国人建构“我们”这一概念时的心理机制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于一般信任水平的影

^① 这里对于“内”与“外”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个个体可以随时扩展自己的信任半径,从而将“外人”纳入到“自己人”的范畴。

响可能存在两种机制,一种为“关系机制”;一种为“类别机制”。

所谓“关系机制”是指人们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的社会交往网络。个人对处于中心的成员(例如家人)有较高的信任程度,而随着交往范围向外扩展,对于那些和自己联系不是十分密切的个体的信任程度会随之降低。用费孝通的话来说,“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1998:27)。因此,关系机制代表了一种“差序格局”,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疏”网络,从自身出发,发散出去。

可以说,儒家文化中的很多主张都与差序格局紧密契合。儒家文化看待信任问题的基点也是从个人与家庭开始的,然后由此向外扩展。例如,儒家对君子的道德约束是从自身到家庭再到国家的,也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很多学者(如 Park & Chesla, 2007; Yum, 1988)指出,儒家文化核心的五常观念(仁、义、礼、智、信)都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这种差序格局下“自己人”和“外人”的波纹式的“内外亲疏”。例如,“仁”和“义”是儒家传统的核心道德品性。这种品性所涉及的是对自己圈子(community)内的个人所持有的一种情感性关怀(Cua, 2000)。在这层意义上讲,“仁”和“义”并不是西方式的那种无差别的、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抽象的人文(humanitarian)关怀,而更多的是基于人际亲疏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有差别的情感归属,故而是特殊取向的(particularistic)。根据儒家文化传统,这种“仁”和“义”的起始点落在家庭内部,即首先是对父母的爱与孝敬,与之紧随的是对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的关怀(Park & Chesla, 2007),之后才惠及家庭之外的成员。如果说“仁”和“义”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礼”则是一种外在的行为约束规则。“礼”涉及的是一种社会角色和与之相关的人际关系。与“仁”、“义”的内涵相一致,“礼”也是首先立足于对自身亲近之人的责任与行为约束,然后才是对家庭外个体的责任。帕克和切斯拉(Park & Chesla, 2007)发现,“礼”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家中长辈的尊重和孝敬,强调祭祀祖先或祖先崇拜行为所践行的孝道(filial piety)(Lew et al., 2011)。这些对家庭成员的礼制是整个社会礼制的基础。最后,尽管“智”指代一种区分善恶的能力,“信”指一种能够为他人信赖的个人品性,但“智”与“信”状态的达成则有赖于个人持续不断地遵从于“礼”而实现“仁”,因而归根结蒂还是从另一侧

面强化了差序格局式的亲疏差异。综上,从“关系机制”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儒家文化中极其浓厚的“差序格局”式的道德主张,遵从儒家文化的个体必定首先要信任父母兄弟这样的“自己人”。随着个人交往圈子由家庭内部向外扩展,个人对所谓同自己联系十分稀薄的“外人”的信任程度则是不断降低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文化的某些基本主张虽然会强化差序格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差序格局可以固定不变。相反,在一种关系式的差序格局中,有两种机制可以将所谓的“外人”拉入到“自己人”的行列。“其一是通过通婚、过继、拟血亲关系(例如结拜)等成为具有先赋性关系的自己人;其二是通过具体的交往而被接纳为自己人”(杨宜音,2008:155)。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关系机制”也是有可能让人们超越个人与家庭而去信任其他人的(例如朋友、同学等)。“通过包容关系他人形成‘我们’概念的心理过程,可概括为‘关系化’过程”(杨宜音,2008:157)。然而,由研究一般信任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化”的过程难以囊括作为一般化信任对象的那些与自己联系十分稀薄的个体。这是因为,首先,“关系化”的过程依赖于个体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从而增加同“外人”的交往密度、情感归属,以及相互义务,由此“外人”转化成了“自己人”。但是由于个人的精力、时间限制,这个关系化的过程及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关系化”的过程很难将我们定义的一般信任的对象完全纳入进来。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关系化”过程将太多的“外人”变成“自己人”。此外,我们定义的一般信任是对“外人”的信任,一旦经过这种“关系化”,那些曾经的“外人”就变成了“自己人”,对他们的信任水平已经不足以体现出某种针对“外人”的一般信任,而是体现出特殊信任。鉴于此,儒家文化中强调差序格局的主张可能会通过“关系化”的方式将一些曾经的“外人”转变成“自己人”,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差序格局下的个体对“自己人”的高信任与对“外人”的低信任这一基本逻辑,因为正如费孝通所说,差序格局的特点就是“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1998:27)。

与关系机制相对应,所谓“类别机制”指的是人们可以通过和他人共享相同的群体认同而对“外人”产生某种信任。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归属和成员身份定位是促进一般信任的关键因素。例如,一个人之所以认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同乡是值得信任的,是因为他们彼此共享一种

地缘身份认同(杨宜音,2008)。那么儒家文化本身是否可以建构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从而促进对有着相同群体身份的“外人”的一般信任呢?在这方面,一些以往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答案。

可以发现,在诸多研究尤其是一些经验研究中,儒家文化常常被界定为具有国别意义的族群文化象征和身份认同。如福山强调中国、韩国等因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在经济生活中体现出某种共通性(例如企业规模小、缺乏知名品牌等等)。英格尔哈特和贝克尔基于世界价值调查数据(World Value Survey)(Inglehart & Baker,2000),将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和日本归并为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其依据就在于这些地方的文化价值中都存在儒家传统。德海等人关于信任半径的研究亦采纳这种划分(Delhey et al.,2011)。赵文词在研究台湾社会新佛教组织及民间宗教组织时曾经指出,儒家文化是台湾居民定义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Madsen,2007)。人类学家康豹通过王爷信仰的个案分析了大陆和台湾文化的共通性,指出了儒家文化的身份认同作用(Katz,2003)。实际上,台湾社会很多新发展出来的教派组织(如鸾堂)都在创造性地解释儒家文化经典(如《论语》),并将儒家文化成功地转化为一种类似于宗教身份认同的文化认同(Wang et al.,1997)。甚或直接将儒家文化标定为与群体信仰有关的一种宗教形式,即儒教(Clart,1996; Jordan & Overmyer,1986)。

如果将儒家文化定义为一种族群文化象征和身份认同,一个自然的推论是,接受儒家文化的个体会对那些同属一种文化身份的他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增强其对陌生他人的信任。尤其是如果这种共通的文化身份通过诸如仪式(例如祭孔)等机制不断强化,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就会对所谓的“外人”产生极强的信任感(Dean,1997; Weller,2004)。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应该有促进一般信任的功能。

与关系机制下的差序格局不同,类别机制强调了一种“团体格局”,其中人们不再从自身发散出去建立一种“愈远愈淡”的社会联系。相反,人们的社会联系的出发点是某种群体身份,而处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人,无论是否和自己有比较强的社会联系,都会被赋予比较高的信任。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团体格局下的群体成员并不必然全是“自己人”。换句话说,具有共同身份认同的人可能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或交往,亦即是所谓的“外人”。而人们之所以信任这些“外人”

从而体现出较高的一般信任水平,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群体身份的认同。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类别机制所依据的团体身份完全有可能通过关系机制建立起来(杨宜音,2008)。例如,通过关系机制首先形成某种“团体”,随之这个“团体”渐渐形成某种身份认同(如彼此熟悉的同学在一起活动,久而久之建立一个俱乐部)。后来的人员再参加这个团体,因为认同这个团体身份而对那些同一团体的成员也产生信任,即使这些成员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熟人”或“自己人”。

综上所述,与传统分析儒家文化与一般信任关系的研究所提供的单一的负面图像不同,这里我们认为儒家文化的不同主张会对一般信任产生相异的甚至相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关系机制”,儒家文化有可能会强化个人交往中的差序格局和内外亲疏,从而降低对“外人”的一般信任程度。另一方面,通过“类别机制”,儒家文化也有可能会提供某种共同的群体身份认同,从而能对那些有着共同群体身份的“外人”产生比较强的一般信任水平。那么,从一个数据样本上来看,我们应该会发现儒家文化的不同元素和一般信任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而非单一化的特点。而本文的重点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实证研究来展示出这种多样性,从而同前人的单一性研究结论进行某种对话。

三、数据、变量及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07年中国居民幸福感及文化娱乐生活调查(以下简称中国居民调查)。这项调查由中美多位社会学者设计并由零点调查公司实施具体的问卷收集工作。中国居民调查采用多层次不等概率抽样的方法,覆盖了全国范围内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中小型城市以及乡镇、农村居民。最后的抽样地区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乡镇以及21个行政村(其中西藏和新疆并没有囊括在该调查中)。受访者的选取依据了多层次抽样方法,从城市到乡镇再到行政村。在每一个抽样地点,受访家庭从当地社区中选取,然后在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年龄在16到75岁之间的受访者。中国居民调查整体样本量为7021。由于相关变量的缺失,本文没有使用农村部分的问卷,因此最后的样本量为

5283。在2007年的中国居民调查中,除了常规的社会学和人口学问题之外,问卷还包括了关于个人信任态度以及与儒家文化相关的题器。因此,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对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问卷资料。

“一般信任”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在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中,它的测量通过以下问题完成:请您告诉我在通常情况下,您能不能信任世上的任何人,他们是不是可靠的?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四个选项,分别是“非常可靠”、“比较可靠”、“有一些不可靠”和“完全不可靠”。为便于分析,本文对这一变量做二分化处理,即将“非常可靠”与“比较可靠”重新编码为1,而“有一些不可靠”和“完全不可靠”编码为0。

在自变量方面,由于儒家文化本身既具有强化差序格局的关系面向,也具有提供群体身份认同的类别面向,因此我们这里分别考察儒家文化的这两个维度。其中,儒家文化强化差序格局的面向是通过相应的行为和态度题器来进行测量的。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差序格局中个体的信任水平在家庭中是很高的,而跨越家庭的范围后则会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弱化,因此我们选取了儒家文化中与家庭主义相关的态度、行为问题来测量强化差序格局的儒家文化面向。如福山所言,“中国儒教的本质就是家庭主义”(福山,2001/1995:56)。因此,选取那些和家庭主义相关的测量可以反映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内外有别”。^①具体而言,我们选取了一个行为问题和一个态度问题。行为问题是:在过去一年中您有没有参与上坟?态度问题则是:您觉得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是否主要来自家里长辈的教导?上坟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也是儒家“孝”文化的核心实践,在中国民间代表个人对家庭的一种道德伦理责任。而儒家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张长幼秩序,强调家长对子女在道德观念层面上的教化或传承。因此,这两个问题可以用来测量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关系机制。如果我们将儒家文化看成一种群体身份的认同,那么其测量可以通过下面这个问题完成:请问您是否同意儒学或儒教最适合中国人?该问题亦采取了一种二分化的处理(1=同意;0=不同意)。这个测量能够反映人们如何看待儒家文化和中国人群体之间关系,即对该问题的肯定回

①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所谓的“自己人”并不全部是家人,但是通常而言家人总是会被认定为“自己人”的最核心的成员,因此这里选取了强化家庭观念的题器。

答代表对儒家文化身份的认同,否则反之。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这里提供的三个测量儒家文化的变量足以反映儒家文化的全貌。恰恰相反,我们认识到并且承认儒家文化的很多家庭主义和身份认同以外的内涵是上述三个测量指标所不能够反映的。然而,本文采取的测量指标,无论是强化差序格局的关系面向还是强化团体格局的类别面向,都是和理论上的相关概念保持契合的。此外,在已有的全国性调查中,中国居民调查是少有的涉及儒家文化的数据集。本文中我们选取的变量已经囊括了中国居民调查中所有涉及儒家文化的问题。作为一个基于现存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确实会受到已有变量的限制,但这却几乎是所有类似研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不过,虽然本文测量儒家文化的变量可能存在局限性,我们的研究设计表明本研究的发现的确能够为现有的关于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关系的文献提供新的个体层面的经验,帮助大家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影响,并针对现有研究中的未尽议题填补相关的空白。

最后,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性别(1 = 女;0 = 男)、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民族(1 = 汉族;0 = 少数民族)、户口(1 = 外地户口;0 = 本地户口)、政治身份(1 = 党员、民主党派或者团员;0 = 群众)、家庭月收入(取对数变换)、婚姻状态(1 = 离婚、丧偶以及分居;0 = 其他)、个人幸福度(1 = 非常不幸福;2 = 比较不幸福;3 = 一般;4 = 比较幸福;5 = 非常幸福)、教育水平(1 = 未受正式教育或小学以下;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中专/技校;5 = 大专;6 = 大学本科及以上)、健康状况(1 = 非常不好;2 = 比较不好;3 = 一般;4 = 比较好;5 = 非常好)、对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感受(1 = 很不严重;2 = 比较不严重;3 = 比较严重;4 = 十分严重),以及个人职业(1 = 高层管理人员:机关及事业单位处级以上[不含处级]干部;2 = 高层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如私营企业主、公司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等;3 = 中层管理人员:机关及事业单位处级/科级干部;4 = 中层管理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如公司部门经理等;5 = 普通办事员:机关及事业单位普通办事人员;6 = 普通办事员:企业普通办公室职员;7 =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8 = 律师、会计师、文艺工作者、记者等自由职业者;9 =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司机、后勤等;10 = 服务人员,如售货员、售票员、酒店饭店服务员等;11 = 农民;12 = 军人/警

察保安等;13 = 自我雇佣者,如个体户、小商贩等;14 = 离退休人员;15 = 家庭主妇;16 = 下岗;17 = 无业;18 = 失业;19 = 在校学生)。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采取了常规的 Logistic 回归,将“一般信任”这个二变量分别回归到我们所设定的不同测量“儒家文化”的自变量之上。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城市居民中儒家文化的多维面向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的。在本研究中,缺失值是通过多元填充(multiple imputation)的方式完成的(Little & Rubin,1987)。

四、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发现

本研究采用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参见表 1。由表 1 可知,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有 8.46% 的个体对一般化他人表示信任。其中,测量儒家文化的不同方式体现出了不同的比例。例如,有超过 34% 的城市居民认为儒家文化是适应中国人的,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参与上坟活动的则占据了 64%。最后,接近 3/4 的城市居民表示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受到长辈的影响。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变量	百分比/均值(标准差)
一般信任	8.46%
儒家文化适应中国人	34.23%
上坟	64.70%
受长辈影响	73.80%
性别(女)	51.71%
年龄	39.51(13.49)
民族(汉)	97.15%
户口	14.33%
政治身份(党员、团员、无党派)	24.13%
log(家庭月收入)	7.64(0.70)
婚姻状况(离婚、丧偶、分居)	4.47%

续表 1

变量	百分比/均值(标准差)
幸福度	
十分不幸福	33.19%
比较不幸福	48.31%
一般	15.28%
比较幸福	2.88%
十分幸福	.34%
教育水平	
未受过正式教育	2.52%
小学	7.15%
初中	29.83%
高中/中专/技校	37.18%
大专	14.81%
大学及以上	8.51%
健康状况	
十分不健康	.45%
比较不健康	3.05%
一般	11.01%
比较健康	34.08%
十分健康	51.4%
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	
十分不严重	2.68%
比较不严重	16.88%
比较严重	39.05%
十分严重	41.4%
职业	
机关高层管理人员	.21%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48%
机关中层管理人员	1.35%
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2.96%
机关办事人员	4.27%

续表 1

变量	百分比/均值(标准差)
企业办事人员	7.95%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7.46%
律师、会计师、文艺工作者、记者等自由职业者	2.35%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司机、后勤等	15.03%
服务人员,如售货员、售票员、酒店饭店服务员等	9.45%
农民	1.1%
军人/警察保安等	.37%
自我雇佣者,如个体户、小商贩等	16.29%
离退休人员	12.89%
家庭主妇	5.89%
下岗	3.27%
无业	2.92%
失业	.87%
在校学生	4.91%

(二)儒家文化的不同面向与一般信任的关系

表 2 列举了对一般信任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有三列,分别对应三种不同测量儒家文化的自变量。我们可以发现,在控制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认为儒家文化适应中国人的个体相较于那些不认为儒家文化适应中国人的个体对一般化他人有着更高的信任程度,其似然比达到了 $\exp(0.28) = 1.32$ 。这个发现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即如果将儒家文化看作一种身份认同的话,那么中国人有可能倾向于对其他的中国人保持较高的信任程度,因为彼此共享相同的文化身份。

表 2 的第二列和第三列表明,如果强调的是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伦理规范的话,无论是上坟的行为还是认为个人的价值观颇受长辈影响都与个人的一般信任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与那些不上坟的人相比,上坟的人更不愿意信任他人。同样,那些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受到长辈影响的人比那些价值观不受长辈影响的个体更加不愿意信任他人。可见,平均而言,当个体比较重视儒家文化中强化家庭观念和差序格局的伦理规范时,其一般信任水平会随之下降。

表 2 对一般信任的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因变量:一般信任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自变量						
儒家文化适应中国人	.28 (.14) *	1.32				
上坟			-.32 (.12) **	.73		
受长辈影响					-.44 (.13) ***	.64
控制变量						
性别(女)	-.02 (.15)	.98	-.02 (.13)	.98	.00 (.13)	1.00
年龄	.02 (.04)	1.02	.00 (.03)	1.00	-.01 (.03)	1.99
年龄平方	.00 (.00)	1.00	.00 (.00)	1.00	.00 (.00)	1.00
民族(汉)	-1.22 (.36) ***	.30	-1.19 (.31) ***	.30	-1.21 (.31) ***	.30
户口	-.06 (.22)	.94	-.07 (.19)	.93	-.02 (.19)	.98
政治身份(党员、团员、无党派)	-.63 (.21) ***	.53	-.40 (.18) *	.67	-.40 (.17)	.67
log(家庭月收入)	.12 (.11)	1.13	.22 (.10) *	1.25	.20 (.10) *	1.22
婚姻状况(离婚、丧偶、分居)	.21 (.33)	1.23	.29 (.28)	1.34	.26 (.28)	1.30
幸福度						
比较不幸福	.13 (.16)	1.14	.28 (.14) *	1.32	.29 (.14) *	1.34
一般	-.31 (.26)	.73	-.09 (.22)	.91	-.09 (.22)	.91
比较幸福	.34 (.39)	1.40	.51 (.35)	1.67	.45 (.35)	1.57
十分幸福	.38 (1.14)	1.46	.35 (1.09)	1.42	.28 (1.09)	1.32

续表 2

因变量:一般信任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教育水平						
小学	.03 (.47)	1.03	-.05 (.43)	.95	.00 (.43)	1.00
初中	.13 (.44)	1.14	.10 (.40)	1.11	.14 (.40)	1.15
高中/中专/技校	.12 (.45)	1.13	.13 (.41)	1.14	.20 (.41)	1.22
大专	.01 (.49)	1.01	-.05 (.45)	.95	.00 (.45)	1.00
大学及以上	-.27 (.55)	.76	-.28 (.49)	.76	-.20 (.49)	.82
健康状况						
比较不健康	-1.70 (.79) *	.18	-1.57 (.74) *	.21	-1.41 (.75) #	.24
一般	-1.57 (.71) *	.21	-1.34 (.67) *	.26	-1.25 (.68) #	.29
比较健康	-1.88 (.69) **	.15	-1.52 (.66) *	.22	-1.42 (.66) *	.24
十分健康	-1.45 (.69) *	.23	-1.22 (.65) #	.30	-1.10 (.66) #	.33
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						
比较不严重	-1.04 (.33) ***	.35	-.81 (.31) **	.44	-.84 (.31) **	.43
比较严重	-1.04 (.30) ***	.35	-.82 (.29) ***	.44	-.86 (.29) ***	.42
十分严重	-1.25 (.31) ***	.29	-1.04 (.29) ***	.35	-1.07 (.29) ***	.34
职业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38 (1.38)	.68	-.89 (1.15)	.41	-.83 (1.15)	.44
机关中层管理人员	-1.49 (1.50)	.23	-1.74 (1.10)	.18	-1.60 (1.10)	.20

续表 2

因变量:一般信任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1.11 (1.23)	.33	-1.88 (.94)*	.15	-1.73 (.95)#	.18
机关办事人员	-.08 (1.15)	.92	-.83 (.86)	.44	-.73 (.87)	.48
企业办事人员	-.68 (1.14)	.51	-1.51 (.86)	.22	-1.37 (.86)	.25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 专业技术人员	-.71 (1.14)	.49	-1.36 (.86)	.26	-1.23 (.86)	.29
律师、会计师、文艺 工作者、记者等自 由职业者	-1.07 (1.23)	.34	-1.51 (.93)	.22	-1.43 (.93)	.24
各类企事业单位的 体力劳动者,如工 人、司机、后勤等	-.69 (1.13)	.50	-1.40 (.85)	.25	-1.28 (.85)	.28
服务人员,如售货 员、售票员、酒店饭 店服务员等	-.56 (1.14)	.57	-1.22 (.85)	.30	-1.10 (.86)	.33
农民	.16 (1.24)	1.17	-.61 (.98)	.54	-.50 (.98)	.61
军人/警察保安等	.85 (1.39)	2.34	.09 (1.16)	1.09	.14 (1.17)	1.15
自我雇佣者,如个 体户、小商贩等	-.53 (1.13)	.59	-1.30 (.84)	.27	-1.20 (.84)	.30
离退休人员	-.66 (1.14)	.52	-1.32 (.86)	.27	-1.20 (.86)	.30
家庭主妇	-.48 (1.16)	.62	-1.12 (.87)	.33	-1.01 (.87)	.36
下岗	-1.37 (1.24)	.25	-1.75 (.94)#	.17	-1.63 (.94)#	.20
无业	-.44 (1.19)	.64	-1.28 (.92)	.28	-1.14 (.92)	.32
失业	-.29 (1.29)	.75	-.67 (1.00)	.51	-.60 (1.00)	.55
在校学生	.51 (1.17)	1.67	-.57 (.89)	.57	-.48 (.89)	.62

续表 2

因变量:一般信任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系数 (标准误)	发生比
截距	.53 (1.79)	1.70	.52 (1.51)	1.68	.62 (1.52)	1.86
对数似然比	-819.92		-1032.99		-1030.66	
似然比卡方 (自由度=43)	85.99 ***		82.00 ***		86.66 ***	
样本量	5283		5283		5283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两端检验)。

在表 2 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当儒家文化成为一种促进群体身份认同的资源时,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的关系就会呈现出某种正相关性。这对于福山、雷丁等人的负相关发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发现的可靠性,笔者希望通过另一个样本对其进行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我们有幸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收集的有关儒家文化的一个数据集(N = 1641)来重复分析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潜在的正相关关系。^①

在该数据集中,我们有一组问题用来测量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人的适用性态度问题,包括:(1)儒家的许多主张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2)中国人就应该了解《论语》等儒家经典;(3)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奉行儒家的道德规范;(4)中国政治家应按照孔孟的教导执政;(5)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多党制和选举,而是仁政;(6)儒家有助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7)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应该高举儒家旗帜。对于这些问题,受访者的选项是 5 = 非常符合;4 = 比较符合;3 = 一般;2 = 不太符合;1 = 非常不符合。一般信任的问题是对偶然遇见后、相处不到 3 小时的人的信任水平,选项为 5 = 非常信任;4 = 比较信任;3 = 一般;2 = 不太信任;1 = 非常不信任。与上文的分析一样,我们也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教育水平、政治身份、家庭收入、婚姻状况、职

① 但是康晓光教授的数据集中没有其他可用的变量。因此这里只能交叉验证作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这一结论是本文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我们认为这种交叉验证还是有必要的。

业、幸福度和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① 这些变量的测量在表 3 中比较清楚,就不再赘述。

表 3 对一般信任的排序逻辑斯蒂回归结果(交叉验证)

因变量:一般信任	系数(标准误)	发生比
自变量		
强化群体认同的儒家文化	.38(.05)***	1.46
控制变量		
性别(女)	-.08(.10)	.92
年龄	-.01(.03)	.99
年龄平方	.00(.00)	1.00
民族(少数民族)	.01(.35)	1.01
教育水平(参照组:小学及小学以下)		
初中	-.19(.27)	.83
高中、职高、中专或技校	-.24(.28)	.79
大专	.04(.30)	1.04
大学本科	.29(.31)	1.34
双学位	.52(.92)	1.68
硕士	.14(.43)	1.15
博士及以上	1.66(.56)***	5.26
职业(参照组:党政机关干部)		
雇主/经理(有 10 个/10 个以上的员工)	.84(.43)*	2.32
雇主/经理(有 10 个以下的员工)	.36(.37)	1.43
专业技术人员、会计、律师、教师等	.42(.28)	1.52
办公室工作人员	.01(.30)	1.01
工头或领班	.59(.53)	1.80
技工	.27(.32)	1.31
体力劳动者	-.05(.33)	.95
军人	.03(.85)	1.03
警察	-.76(.82)	.47

① 数据中没有关于户口与健康状况的变量。

续表 3

因变量:一般信任	系数(标准误)	发生比
离退休人员	.11(.32)	1.12
农民	.77(.66)	2.16
下岗	-.45(.37)	.64
无业	.23(.36)	1.26
失业	.14(.49)	1.15
在校学生	.09(.35)	1.09
家庭主妇	.40(.44)	1.49
其他	-.03(.34)	.97
家庭月均收入(参照组:500元以下)		
500-999元	-.83(.45) [#]	.44
1000-1999元	-.54(.42)	.58
2000-2999元	-.66(.43)	.52
3000-3999元	-.53(.44)	.59
4000-4999元	-.61(.46)	.54
5000-5999元	-.87(.46) [#]	.42
6000-6999元	-.79(.52)	.45
7000-7999元	-.34(.60)	.71
8000-8999元	-.78(.57)	.46
9000-9999元	-.11(.75)	.90
10000元及以上	-.75(.54)	.47
政治身份(参照组:群众)		
中国共青团团员	.19(.19)	1.21
中国共产党党员	.28(.16) [#]	1.32
民主党派人士	.36(.59)	1.43
婚姻状况(参照组:已婚)		
未婚	-.14(.18)	.87
丧偶	.75(.63)	2.12
离婚	.19(.42)	1.21
生活满意度(参照组:十分不满意)		
不太满意	-1.38(.52) ^{**}	.25

续表 3

因变量:一般信任	系数(标准误)	发生比
一般	-1.23(.50)*	.29
比较满意	-1.22(.50)*	.30
非常满意	-1.33(.54)**	.26
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参照组:非常不严重)		
不太严重	.87(.96)	2.39
一般	.53(.87)	1.70
比较严重	.23(.86)	1.26
非常严重	-.10(.86)	.90
对数似然比	-1721.88	
似然比卡方(自由度=54)	200.80***	
样本量	1614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两端检验)。

表 3 和表 2 传递了同样的信息,即儒家文化中促进群体身份认同的元素会促进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由于表 3 的发现是采用不同数据进行的交叉验证,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当儒家文化促进某种群体身份认同时,其与一般信任水平的关系应当是正相关的。

(三)有关“负效应”中介机制的考察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儒家文化中那些强调差序格局的元素的确如我们假设的那样会阻碍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下面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负相关关系的内在机制,即为什么对家庭观念的强调会降低对一般化的“外人”的信任程度?根据“关系机制”,我们这里提出的一个假设是:儒家文化因为过分强调了对“自己人”的信任而压制了对“外人”的信任,用统计学的语言表述就是,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主张和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是由于信任“自己人”这个变量的中介而形成的。一般而言,这种中介关系是通过中介模型进行探讨的。但是与一般的基于线性模型的研究不同,在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由于我们需要在概率和发生比之间进行转换,那么即使没有中介效果,这种不同数学表达之间的变换也会人为地造成中介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取埃里克森等人(Erikson et al., 2005)和布伊斯(Buis,

2010)所采用的 logistic 模型下中介效果的分析策略。

选取家庭成员作为代表性的“自己人”，我们分析了对家庭成员的信任能否成为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面向和一般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采用布伊斯的方法，我们将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面向对一般信任的效果分解为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和通过对家人信任而达成的间接效果(indirect effect)，其发现参见表4。表4表明，间接效果基本上不存在。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上，我们都无法测量出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在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面向和一般信任之间的中介效果。换句话说，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变量和一般信任之间的显著关系并不是通过对家人的信任这一变量达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我们的假设。

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面向与一般信任的负相关不是由于儒家文化中过分强调对“自己人”的信任造成的。这意味着，在一个差序格局内，虽然“自己人”和“外人”是彼此亲疏有别，且呈现出不同的信任程度(即高度的特殊信任与低度的一般信任)；但对“自己人”的信任与对“外人”的信任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无论一个人是否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好友这样的“自己人”，他在差序格局下总会对那些与自己没有直接联系的个人呈现低信任水平。如果用一个类比来表示的话，差序格局下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的不同波纹，如同一个个网格一样，将个人所交往的不同类型的人作了分门别类，而对分到“自己人”类别的人的态度是和对分到“外人”类别的人的态度彼此分离的。这个发现从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差序格局的概念提供了新的启示。

表4 家庭成员信任的中介分析^①

	上坟	受长辈影响
整体效果	-.32(.15)**	-.44(.12)***
间接效果	.00(.00)	.01(.00)
直接效果	-.32(.15)**	-.45(.12)***

注：*p < 0.1, **p < 0.05, ***p < 0.01 (两端检验)。

说明：效果系数(自助法标准误)。

① 布伊斯列举了两种衡量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方法。就本研究而言，两种方法的结论一致，因此仅将其中一种方法的结果展示出来。

五、总结与讨论

儒家文化必然会降低个体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吗?文化研究和基于国家间比较的经验研究都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一些未尽议题的存在让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本文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析,而是关注中国城市居民对于儒家文化不同内涵的接纳是否会影响他们对一般社会成员信任。此外,本文相对于前人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突破在于改变了过去“贴标签”式的研究儒家文化的方式,而分别考察了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功能与提供身份认同的功能。最后,本文总结了儒家文化到一般信任的过渡机制,并分析了差序格局下对于“自己人”的高强度的特殊信任是否在儒家文化以及一般信任之间起到某种中介作用以致弱化一般信任水平。通过分析2007年的中国居民调查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取决于儒家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的维度。当人们更多地重视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的那些实践和主张时,我们的发现证实了已有研究反复论证的观点,即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次,如果人们只是将儒家文化看成是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中国人便因为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而成为一个共同体。此时,认为儒家文化适合中国人的那些人就表现出了对他人的高度信任。这个发现是本文对已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同时也指出了过去研究中片面地从一个社会的“平均情况”来理解儒家文化会掩盖儒家文化里促进一般信任的积极因素。

第三,进一步探究儒家文化中强化差序格局所带来的对一般信任水平的负效果,我们检验了一个假设,即儒家文化因为在差序格局中强调了对“自己人”的信任,从而间接弱化了对“外人”的一般信任。然而,本文的发现表明,至少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人”的信任并不足以影响儒家文化与一般信任的关系。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人们对儒家文化具有不同的感知或看法呢?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在经验分析上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本文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考方向,以求为未来的经验研究提供借鉴。我

们认为,儒家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界定,原因可能在于不同人群或者不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差异。

笔者认为,个体如何理解儒家文化应当和其所处环境的现代化水平息息相关。在一个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异质性环境里,儒家文化往往成为众多界定个体身份和彼此界限的一个维度;相反,在一个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同质性环境内,个体有可能更倾向于将儒家文化和传统的差序格局关系结合起来。这些理解儒家文化的不同方式造成了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截然相反的联系。为什么现代化水平有可能影响个人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呢?这是因为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环境下人际关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社会异质性、多元化凸现。个体需要不断寻找各种新的社会或文化身份来建构彼此间的界限。自然,儒家文化是一个可以被采用的文化身份。尤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环境下的人们常常需要同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接触,他们需要一种共通的文化身份来定义何谓“中国人”。儒家文化是人们首先想到的文化身份。与之相比,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很少存在这种动态的不断定义彼此身份界限的情形。由于人们的活动无论在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上都有限,传统的家庭身份定位已经足够。此时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也就更可能相对保守,从而对一般化的“外人”缺乏信任。

以上理论解释是否符合现实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验证。本文考察的城市人口可以区分为城市人口和城镇人口。如果我们的解释成立,那么城市人口则更倾向于将儒家文化界定成为文化身份,而城镇人口则更倾向于将儒家文化同差序格局结合起来。我们建构了一个二分变量来指代居住地区(1 = 城镇;0 = 城市),然后将其和本文所考察的三个测量儒家文化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居住地区和上坟(相关系数 = 0.11, $p = 0.00$)以及受长辈影响(相关系数 = 0.03, $p = 0.03$)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居住地区与认为儒家最适合中国人之间则是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 = -0.06, $p = 0.00$)。这些发现为我们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经验肯定。

显然,本文的研究与前人主张的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不同,我们的经验发现强调,当讨论儒家文化与一般信任的关系时需要重视儒家文化赋予不同个体或群体的特定内涵。在经历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儒家文化已经不能够简单地被看作一组强化个人差序格局、阻碍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文化体系。相反,儒家文化在现

代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宽泛的群体身份认同,从而带来一个有别于差序格局的团体格局。至少就本文而言,无论是关系式的差序格局还是类别式的团体格局都能够在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效应里得到展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展现标示着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两种格局共存的状态。未来怎样?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儒家文化确实有可能形成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从而适应现代人、陌生人的生活。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儒家文化同团体格局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带来的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 福山,2001/1995,《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雷丁,2009/1990,《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谢婉莹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 杨宜音,1998,《自我及其边界:文化价值取向角度的研究进展》,《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 ,1999,《“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01,《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第13期。
- ,2008,《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Beugelsdijk, Sjoerd, Henri L. F. de Groot & Anton B. T. M. van Schaik 2004, “Trust and Economic Growth: A Robustness Analysi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6(1).
-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 Bohnet, Iris & Richard Zeckhauser 2004, “Trust, Risk and Betraya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55(4).
- Buis, Maarten L. 2010,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 a Logit Model.” *Stata Journal* 10.
- Clart, Philip 1996, “The Ritual Context of Morality Books: A Case-Study of a Taiwanese Spirit-Writing Cult.”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 Cua, A. S. 2000,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Edward Craig (ed.), *Concis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 Dean, Kenneth 1997, “Ritual and Space: Civil Society or Folk Religion?” In Timothy Brook &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City: M. E. Sharpe.
- Delhey, Jan & Kenneth Newton 2003, “Who Trusts? The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in Seven Societies.” *European Societies* 5.
- 2005, “Predicting Cross-National Levels of Social Trust: Global Pattern or Nordic Exceptionalism?”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 Delhey, Jan, Kenneth Newton & Christian Welzel 2011, “How General Is Trust in ‘Most People’?”

- Solving the Radius of Trust Problem.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
-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Michelle Jackson, Meir Yaish & David R. Cox 2005, "On Class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02(27).
- Hardin, Russell 2006, *Trust*. Cambridge, UK: Polity.
- Ho, David Y. F. 1991, "Relational Orientation &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Bulletin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26 - 27.
- Inglehart, Ronald & Wayne E.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 Jordan, David K. & Daniel L. Overmyer 1986, *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tz, Paul R. 2003, "The Cult of Royal Lords in Postwar Taiwan." In Philip Clart & Charles Brewer Jones (eds.), *Religion in Modern Taiwa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Knack, Stephen & Paul J. Zak 2002, "Building Trust: Public Policy,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 10.
- Lew, Seok-Choon, Woo-Young Choi & Hye Suk Wang 2011, "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Korea: The Significance of Filial Pie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 Lin, Yutang 1977,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Hong Kong: Heinemann.
- Lindström, Martin 2012, "Marital Status and Generalized Trust in Other People: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9.
- Little, Roderick J. A. & Donald B. Rubin 1987,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New York: J. Wiley and Sons.
- Madsen, Richard 2007, *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sztal, Barbara A. 1996, *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Research for the Bases of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ark, Mijung & Catherine Chesla 2007, "Revisiting Confucianism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sian Family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13.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utnam, Robert D. & David E. Campbell 2010,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New York City: Simon and Schuster.
- Rothstein, Bo 2002, "The Universal Welfare State as a Social Dilemma." In Bo Rothstein & Sven Steinmo (eds.), *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midt, Corwin E. 2003, "Religio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Life: Concluding Thoughts." In Corwin E. Smidt (ed.), *Religion as Social Capital: Producing the Common Good*. Waco: Baylor

- University Press.
- Soothill, William E. 1913,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Sztompka, Piotr 1999, *Tru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slaner, Eric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Jianchuan, Yumin Zhou & Meirong Lin 1997, *Gaoxiongxian Jiaopai Zongjiao [Sects in Gaoxiong County]*. Gaoxiong, Taiwan: County Government.
- Weber, Max 1951,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elch, Michael R., Roberto E. N. Rivera, Brian P. Conway, Jennifer Yonkoski, Paul M. Lupton & Russell Giancola 2005,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Trust." *Sociological Inquiry* 75 (4).
- Welch, Michael R., David Sikkink & Matthew T. Loverland 2007, "The Radius of Trust: Religion,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Trust in Strangers." *Social Forces* 86(1).
- Weller, Robert P. 2004, "Authority, Local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lternate Civil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Korea Observer* 35(3).
- Yum, June Ock 1988,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East Asia."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5(4).
- Zucker, Lynne G. 1986,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 - 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罗琳

PAPER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rust in Govern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Gao Xuede & Zhai Xuwei* 1

Abstract : Previous research on trust in government is mostly based on urban residents or rural residents separately, whil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hem are still absent. Based on survey data in six regions of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displays a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hat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particular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more trustworthy than lower levels of government, but urban resid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is lower than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especially for grass-roots government.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ata shows that both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nd cultural variables have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for government trus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ut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have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The two kinds of variables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government trus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isting findings on trust in governmen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Revisi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Generalized Trust: A study based on 2007 Chinese spiritual life survey
 *Hu Anning & Zhou Yi* 28

Abstract :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generalized trust always negative? Cultural analysis and cross-society studies provide an affirmative answer. However, some unsolved issues encourage us to reexamine this research question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By analyzing 2007 Chinese spiritual life survey data, the authors find: first, there is indeed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generalized trust, which, however, is contingent on the specific dimens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f individuals emphasize Confucian teachings which enhance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generalized trust

is negative. However, if Confucian culture is treated as an identity, Chinese people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constitute a community with the same value. In this case, Confucian cultur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eralized trust. Besides, mediation test suggests that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enhancing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generalized trust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specific trust in “*zijiren*” (insiders), which means the trust in “*zijiren*” and the trust in “*wairen*” (outsiders) is not associated. This research corresponds to previous studies by Fukuyama and Redding, and our findings expand these classic studies.

Doctor-Patient Trust in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Society: A study on two villages in central China
..... *Fang Lijie, Liang Xiaoyun & Jin Chenggang* 55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in two villages in central China,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rust logics in doctor-patient trust in rural society. Villagers’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is personal trust, while their trust to doctors of township hospital is institutional trust.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ising of villagers’ expectation for health service, the logic of villagers’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would be a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t the same time, both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have shaped doctors’ behavior.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for the new medical reform is that to improve villagers’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village doctors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enhance their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villagers’ personal trust to village doctors should be fully used and strengthened to regulate and monitor village doctors’ behavior.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A China-Britain comparison
..... *Bian Yanjie & Hao Mingsong* 78

Abstract: Individuals are connected to society throug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social networks, namely,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of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formal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people’s group identitie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se two kinds of social network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issue by comparing cultural and social-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use relevant survey datasets to test several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hina is higher in the stock of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but lower in that of formal social networks than Britain; and (2) China’s distribution of both kinds of social networks is more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mo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status resources than Britain’s.